

◎沙健孙 主编

中国共产党 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

（下）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规划项目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 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



主编 沙健孙
副主编 全华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规划项目

山东人民出版社

目 录

1921 年	(1)
1922 年	(2)
1923 年	(18)
1924 年	(38)
1925 年	(56)
1926 年	(81)
1927 年	(100)
1928 年	(121)
1929 年	(131)
1930 年	(143)
1931 年	(154)
1932 年	(165)
1933 年	(174)
1934 年	(187)
1935 年	(192)
1936 年	(217)
1937 年	(232)
1938 年	(261)
1939 年	(267)
1940 年	(287)
1941 年	(312)
1942 年	(327)

1943 年	(334)
1944 年	(341)
1945 年	(358)
1946 年	(388)
1947 年	(402)
1948 年	(414)
1949 年	(450)
1950 年	(489)
1951 年	(508)
1952 年	(525)
1953 年	(559)
1954 年	(598)
1955 年	(616)
1956 年	(633)
后记	(676)

1921 年

7 月 23 日—31 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大会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写道：

“一、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本党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4）联合第三国际。

“三、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四、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 页、第 5 页。）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第五部分“对现

有政党的态度”中写道：“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1922 年

1月21日—2月2日 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后移至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有：张国焘、瞿秋白、邓恩铭、王烬美、邓培、张秋白等。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宣言》指出：“这是最近才经过的事情，这些强盗们集合在华盛顿——美国交易空气的农〔浓〕荫里，图谋成功一个结合更有力的来侵略远东各民族。这次会议的结果就是他们已结成了他们吸血者的同盟。朝鲜，东部西伯利亚及满洲！这几处他们已允许日本独吞了；对中国他们所采用的，便是他们一切抢夺利益的分配要有个协调，而且承认在这个恶毒的侵略里是让美国资本来做领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本年初 伊罗生^①在《与斯内夫利特^②谈话记录——关于

（①）伊罗生（原名 H·R·Isaacs，伊罗生是他的中文名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教授，曾在中国工作。1932 年他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就用伊罗生这个中国名字。

（②）即马林。

1920—1923 年的中国问题》(1935 年 8 月 19 日)中记述了马林的谈话：“1922 年初，我们安排在杭州西湖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我记得还有瞿秋白，另外还有一个很能干的湖南学生，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

“这次会议上，讨论了中国党和工人运动的前景。我坚持了以下观点：首要的是，赤塔政府对待吴佩孚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这次强有力的海员罢工和国民党的领导证明民族主义运动同工人阶级组织之间的联系已经建立；到那时为止，工人阶级活动的最强烈表现是香港罢工；国民党领导集团方面对群众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相联系的重要性缺乏理解，这是中国反帝力量在发展民族主义运动道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国民党松懈的组织形式使得在党内很容易促进群众运动的思想，因此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的人应该利用左翼（廖仲恺）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他们应该加入国民党，但应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并应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

“我提出这些意见时，从来没有从莫斯科得到什么具体专门指示的问题。我离开莫斯科时没有什么指示。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伊斯兰教联盟是爪哇最早的群众组织。它建立于 1911 年，具有经济、社会和宗教混合一体的性质。它的斗争锋芒直指欧洲糖厂主对爪哇人的剥削。这个群众组织的左翼（集中在三宝瓏）接受印地社会民主同盟的宣传，这个同盟是我帮助组织并使之沿着阶级斗争路线开展宣传。这种宣传在伊斯兰教联盟内部得到了强烈的支持，特别在 1914—1918 年的战争年代里是如此……

“由此，你就能理解在中国努力同国民党建立这种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爪哇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保持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是这条路线的逻辑结论……

“在杭州，绝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些观点。只有一两个人反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反对最强烈的是张国焘。这些反对者的论

据，集中围绕着对国民党的评价问题、它成为群众运动组织的可能性问题，以及预料得到的、来自国民党领导人方面的反对的问题，等等。陈独秀同意我提出的观点。没有要求作补充说明的明确的反对意见。

“（在这里，伊罗生向斯内夫利特提出询问，说他关于这次会议的叙述同陈独秀所说的有出入。他回答说：）

“如果陈独秀的叙述是真实的，那么，第一，杭州会议后的一个时期，这个问题曾有许多机会拿到莫斯科讨论，中国的同志也可以把这个问题提交同年后期来华的越飞，但当时没有此种做法。第二，没有‘服从纪律’这个问题。我向来十分反对这种手段。何况，我并没有从共产国际得到什么专门指示，我手头没有任何文件。

“我认为这是可以采取的唯一策略。一切决定于我们的同志是否有能力保持他们的独立性和他们的报纸。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有爪哇的经验为依据，而且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讨论和大会所通过的殖民地问题提纲。

“况且，香港海员大罢工证明国民党与工人阶级组织有真正的联系，国民党也愿意与工人阶级组织保持友好联系。当时，南方的工人阶级组织正在发展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在上海和北方情况大不相同，那里只有少数工人俱乐部。这就使得加入国民党更有必要。因此，作出这个决定基于三个因素：爪哇的经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以及南方无产阶级组织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所处的有利地位。其中包含的危险并不大。国民党的组织形式是松懈的，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推行我们的思想和开展革命的反帝群众运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孙中山在 1922 年被陈炯明逐出广州后，我曾与他在上海多次会谈。他请我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阐述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他变得更易于接受意见了。我劝他不要用军事行动收复广州。我向他建议要使上海成为一个在全国城市工人中以及在农民中积极开展宣传

工作的中心。国民党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右派反对这个建议，他们想不要群众参加而实现民族主义目标；但是以廖仲恺为首的左派则赞成这个意见。由于孙中山在广州的失败，迫使他不得不按照发展现代群众运动的路线来考虑问题，其次，考虑从俄国取得援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256页。）

3月15日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①在给列宁的信附录“督军”中说：“广东省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摇篮，是目前设在广州的南方政府的管辖地。省长是陈炯明将军，他是一名革命者，有20多年党龄的国民党党员。陈炯明将军是解放了的年轻的中国的最著名活动家之一。按从政年限、对革命思想的忠诚和组织才干，陈炯明与孙逸仙博士可以相提并论。孙逸仙的私敌反对他的‘独裁’倾向，认为陈炯明的治国谋略比孙略胜一筹。”

“陈将军是民族资产阶级中最‘有声望’的人物，他有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同情心，行动很谨慎。政治阴谋家试图利用他这后一种‘特性’，制造他与孙逸仙博士的不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第78页。）

4月6日 陈独秀在致吴廷康（即维经斯基）的信中，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谈了否定的意见。他指出：“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

①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时任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

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5月 蔡和森在《中国劳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指出：“中国无用说是被国际资本主义侵略的弱国，但中国的资本家是不受害的，受害的只有工人阶级。资本家不但不受害，而且他们所藉以上升的楼梯就是国际资本。原来工业后进国的资产阶级不过是国际资本的附属品。他们必须仰仗国际资本，才能开工厂、开公司、开银行。他们的工业资本、银元资本，概须仰仗于外资，所以他们的资格无异就是英、美、法、日资本家的驻华代表。最显著的例，就是旧交通系和新交通系。”

“据欧美各国的历史看来，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总是在资产阶级获得政权，和资本政治巩固之中及巩固之后。同样的事情，现在就轮到中国来了。中国资产阶级，现在虽然这样微弱、无能，但是他们的第一举必然是掠夺政权，凭着国家机关，吸收外资，以供私人的产业经营；凭着国家权力、军警、法律、议院，以高压工人阶级，他们将以‘戒严令’统治工厂的工人，以‘枪毙’对待罢工者。

“总之，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那派军阀财阀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这样‘恐怖的资本主义’，正是英、美、法、日等国际资产阶级要求在中国赶快建设的。”

“然则无产阶级怎样对付这种‘恐怖的资本主义’呢？惟一的办法，只有无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组织工、兵、农的国家机关，没收一切生产手段——地、大工厂、资本——和交通工具为国有，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发展中国的大生产事业，以建筑共产社会的经济基础。”（《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83—85 页。）

6 月 15 日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真的民主派，必须有两种证据表现于人民面前：（一）他的党纲和政策必须不违背民主主义的原则。（二）他的行动必须始终拥护民主主义与军阀奋斗。在这一点看起来，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但是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受〔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我们目前奋斗的标目〔目标〕，并非单指财政公开，澄清选举等行政问题，乃以左列各项为准则：

“（一）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

“（二）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

“（三）采用无限制的普通选举制。

“（四）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

“（五）定保护童工女工的法律及一般卫生工人保险法。”（中央

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第44—45页。）

7月11日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说：“现在我想首先谈谈国民党组织的性质。在同几个领导人谈话中我明白了，国民党由4种人组成。

“1. 起主导作用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人参加过辛亥革命。这些领导人中有不少在日本或法国接触过社会主义，自称社会主义者。孙中山也属于这一类，他曾亲自跟我说，他是布尔什维克。孙中山的3名助手组成的一个小组，有一段时间在广州出版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月刊，只是在组织北伐以后，这个月刊才停办。同我联系的军官中有不少人对俄国革命和红军组织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2. 华侨，即国民党组织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总是帮助工人政党改善经济状况，并希望党统一中国，建立秩序和安定，消除军阀混战的影响，捍卫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的这部分资产阶级侨居异乡，直到最近才在中国建立了资本主义企业。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国民党的领导人从未表达过这个群体的需要。

“3. 南军中的士兵。这些没有社会地位，处境恶劣的人加入了国民党，尽管将领们反对士兵加入政党。身为国民党员的年轻军官在士兵中进行宣传，就连孙中山本人，在到达桂林以后，也多次在集会上谈到国民党组织的宗旨，同时还强调要以俄国军队为楷模。

“4. 工人。特别是在广东省和华侨当中，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今年1月海员大罢工期间，我清楚地看到工人同国民党之间的联系情况。这个政治组织的领导人指导着罢工的全过程。罢工工人参加了这个党的民族民主主义的示威游行，所有资助都来自国民党方面。广州的共产主义小组同罢工海员完全没有联系，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支持罢工，因为那里的党认为只能进行秘密工作。国民党同罢工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在广州、香港和汕头大约有

12000 名海员加入了国民党。

“党的纲领为各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其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奉行的是以反对外来统治，主张民主，让国民的人格受到尊重，过上幸福生活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把这最后一个要求解释为民生主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34—235 页。）

7 月 16 日—23 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写道：“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

“（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

“（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14 页、第 115—116 页。）

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指出：“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不如此无产阶级便无法得着为自己阶级开始团结所必需的初步自由，所以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认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表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是能够应付时势之急迫的要求的，今后更应扩大此主张，并规定进行计划如左：

“（A）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

“（B）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

“（C）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教职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6页。）

7月 据1926年蔡和森回忆：“1922年C. P. 第二次全国大会时，国际代表主张马上加入国民党，而有一部分不赞成加入，有一部分在理论上赞成，但关于具体方法，会议的结果要中央解决之，所以我们决定用C. P. 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信致国民党，请求联席会议。但中国政治问题而实际上做不到，因为孙中山不承认有C. P. 的党，故因此未作。”

“C. P. 第二次大会议决了政治的纲领，内容是对于时局的宣

言，号召各阶级与国民党合作，这是党未开西湖会议以前的两件事，这时候党员和团员对加入国民党非常不满意，但在另一方面又看不清革命的道路，这些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是：第一在主义上与三民主义不合潮流；第二组织的方法不能适合新的要求；第三革命方法倾向于军事运动，所以不赞成加入国民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342页。）

8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召开了西湖会议。对此，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回顾说：马林提议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组织。他“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5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从此国际代表（及中共代表）进行国民党改组运动。差不多有一年，国民党始终怠工或拒绝，孙中山屡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国际代表马林因此垂头丧气而回莫斯科，继他而来的鲍罗庭，他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1924年（民国13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341页。）

对此次会议，张国焘回忆说：“马林在这次会议中是主要的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大概是为了减少反对，他

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他的论点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关于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其主要理由大致是：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时。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

“我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我们认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党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我们指出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这有过去国民党和其他派系建立联盟的实例为证；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孙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也可比中共人数多一倍左右。我们所要说明的中共并不是要求与国民党来个平行的联合战线。只是不要丧失独立性。我们还着重指出，中共除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注意争取国民党以外的广大工农群众来壮大自己。根据这些观点，我们要求不接纳马林的主张，并请共产国际重新予以考虑。

“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详细说到，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

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

“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先生还提出只能有条件的服从。他着重指出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

“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虽同情我们的某些看法，也称许陈先生所提出条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他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经多年，挂着国民党党籍，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未受到任何约束。即单纯的国民党员也抱有各种不同的政见，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也不少，足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他也判断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通行的办法。

“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这种看法，向我们疏通，认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结果，这次会议并未以文字的形式，而是以一种互相谅解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先生所提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以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这种决定显然对马林原有的中共党员无条件无限制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已作了相当的修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344页。）

8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给其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中写道：

“一、代表的全部活动应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